

## 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（山西篇）

# 我们曾经年轻（3）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董丰

（本文<2>请看本报11月1日第B2&B3）

### 探亲

秋天我和郑丽娜回京探亲，这是我第二次和她一起出门。有了去大同的经验，我对她的果敢决断坚信不疑。对于用一年的辛勤劳动挣不回口粮钱的知青，买回京的火车票是一种奢侈。社会把知青抛给农村，抛进赤贫，知青回报的是对社会规则的不恭和反叛，我们决定逃票乘火车回北京。如今众人笑谈中国大爷大妈的种种令人侧目的小伎俩，都产生于在那个贫穷时代中的历练。

有不少知青总结出了可以言传身教的逃票经验。他们对各个车站的地图，站内换乘列车的时间表和站台位置都了若指掌，进出站不经过检票口。他们甚至掌握了各次列车上的查票规律，有相对应的规避措施。手里没票，我一路忐忑不安，看到查票的列车员走过来，心里翻腾着如何应答。结果她故意对我们视而不见，扭头去查别人，让我们避免了尴尬。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波及了大多数的城市家庭，知青生活的窘迫众人皆知。很多列车员抓到知青逃票也不予深究，因为你把他赶下火车，他只能再蹭别的列车。我们平安到达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，又沿着铁路线走出了站台。这是文革大串联中我们走南闯北免费乘车的另一个版本。

父亲下放到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。他工作在中国唯一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——中国民主建国会，也被囊括在中央机关的盛名之下，反正是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。

干校开始建在吉林舒兰县山区，一条老乡的狗经常到干校食堂混饭，成了他的朋友。父亲每天要挑担子走山路给地里干活的人送午饭，一路有狗陪伴。一天父亲去送饭，狗拦住他，焦躁不安地叫着，死活都不肯放他过去，饭没有送成。后来老乡告诉他，路上有一只熊瞎子拦路，是狗救了他。真不知道高度近视、脚有疾患的父亲遭遇了熊瞎子会是什么结局。

珍宝岛事件以后，干校搬到了湖北襄樊地区的平原。地方偏僻，需要有牲口犁地，需要有马车运物捎脚。一帮知识分子老朽们不懂行情，又求马心切，湖北老乡趁机高价卖给他们一匹又老又瘦的病马。马都是站着睡觉，而这匹老马一到晚上就卧地不起，第二天早上要几个男人费力把它抬起来颤巍巍地站住，才能套辕驾车。如此以往，大家不堪劳累，就集思广益想出一个办法，用大被单兜住它的肚子，挂在房梁上，让它无法倒地。办法奏效，免去了第二天众人的辛苦，但是没有多久，老马就死了。

妈妈所在的北京轻工业学院经历了一场新的浩劫，被整个搬迁到陕西咸阳，与西北轻院筹备处合并，成为西北轻工业学院。原本妈妈留在北京轻院留守处，等待在京分配工作，但是大专院校文革运动紧锣密鼓，她这个老运动员不可逍遥法外，必须去咸阳

参加运动。

我回家探亲时，父母都不在北京，坚守北京老屋的是12岁的妹妹。母亲把82岁的外祖母接到家里和妹妹作伴。

我们居住的北京四合院原来属于私人，房东汪老太太住在后院的北房。两进的四合院原本很漂亮，从胡同走上五级石阶，迈过高门坎，大门里是遮风避雨宽大的门洞过道。对面的影壁上有精致的砖雕花纹，影壁前左转通过硬木隔断门，下台阶进入前院，左边一溜五间临街的南房就是我家。去前院的西小院要经过圆圆的月亮门，墙的顶端是一排由瓦片镶砌的花边。院子里各种花树点缀，前院有丁香、梨树、迎春花和珍珠梅，后院有几棵参天的大洋槐。多年里我梦中的家往往就停留在这个四合院布局。房子被房管局接管以后，疏于维修，墙坏了拆墙，门坏了卸门，只保留居住功能部分。加上贪心用户的拆挪，漂亮典雅的四合院逐渐变成了破败的大杂院。

我家从1953年就租住在这里，面对前院的是三间正室。连通的卫生间和一间单独的厨房伸到西小院里。文革中，住房要根据各家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人数搞平均主义。由于我和姐姐插队，户口迁出了北京，房管局硬性收回了我们的卫生间和厨房。原来西小院的北房住着四川人张奶奶，很会养花。她本名吴雪松，是国民党军官的遗孀，文革中遭批斗，被赶到我家厨房。她的房子分给了一户城市贫民。后院东屋原来住着张大爷和他的两个儿子，小林子和小顺子。因为他1949年以前做过警察，文革中遭折磨全身瘫痪，他的房子分给了一个工人家庭。小林子去东北插队，偷盗流窜颇有名气。张大爷和小顺子被赶到我家卫生间。由于疼痛和郁闷，他经常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突发的一声喊叫十分瘆人。

房管局和街道还想砍掉我家一间住房，但是因为房屋的结构很难分割，只好作罢。砍去了卫生间，我们都要用院子里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水龙头。没有厨房，做饭的蜂窝煤炉子只好露天放在门外的台阶上。妹妹在父母和姐姐们离开北京以后和外祖母一起生活，一个活泼伶俐的小姑娘变得孤僻寡言。张奶奶是老邻居，文革前就给我家帮零工。此时全靠她帮忙照顾协调，共度时艰。

我回北京探亲，有了和姥姥一起生活的一段短暂的时间。我跟她学絮棉花、做棉衣，喜欢听她唠叨她的经历和亲人们的故事。她五岁时被父亲强迫裹小脚疼痛难忍，年轻时养蚕织布和到青岛求学，她怀着孩子临产了还在教书供丈夫完成学业，她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抗战中的家破人亡。姥姥经常晚上失眠，起来点上一只烟坐到天明，早上告诉我她又“犯思虑了”。

她的两个大儿子作为空军轰炸机驾驶员和军医在抗日前线牺牲了。她丈夫是大学教授，随学生大队撤

退到四川万县。离家八年终于等到抗战胜利，他却在兴奋中带着回家的梦离世了。抗日胜利后姥姥作为抗战英雄母亲上过报纸，被陈诚接见，收到烈士家属抚恤，而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骂、抄家、剃阴阳头。她不屈的性格让她站在院子中间，面对抄家的红卫兵大唱“东方红”，让那些中学生立马伫立，不知所措。直到1976年89岁时去世，她始终坚持说，儿子们为国捐躯是民族英雄，政府不能把他们泯灭了。姥姥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一生的艰难坎坷没有让她退缩，始终坚强而仁慈。

郑丽娜在北京，常常到家里一起和姥姥聊天。十月初她急匆匆来我家，一进门就急不可耐地把我拉到里屋，神秘而兴奋地告诉我，林彪叛逃摔死了。消息的突然让我禁不住惊叫了起来。对上层的权斗我不了解，但是林彪推崇个人崇拜，让很多人反感。他认为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”，让人不寒而栗。1967年我们在江西串联时经历了部队发枪武装造反派加剧武斗。后来各地又多次实施军管。我曾经怀疑林彪接班后中国会出现像东南亚国家一样的军人独裁，但是马上又为自己的想法害怕，告诫自己绝不能说出口。如今副统帅的叛国出逃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，这预示着文革中很多神话的破产，预示着剧情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。

妈妈去了咸阳。即便她的档案关系仍然在北京，西北轻院对她的批判丝毫不放松，因为没有活靶子的运动不能维持凝聚力和战斗力。一个叫栾惠斌的女人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从故宫博物院调到轻院，当上了化工系的党总支书记，管制那些落魄的大学老师。在她的极左思想和淫威之下妈妈度日如年，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我决定回罗庄前去咸阳看望妈妈。

妈妈住在一间单人宿舍，里面只有上下床和桌子，四壁皆空。几个原来西北轻院筹备处的青年教师，何友凌、孙恪慎等对妈妈都很好，经常看望她给予关照。原北京轻院的很多老师也关心同情她，不离不弃。但是架不住文革针对知识分子的绞杀和栾书记的霸道强势，她总能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对妈妈轮番作战，穷追猛打。妈妈有严重的膝关节炎和高血压，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。

父亲三岁丧母，继母是陕西兴平人。我和妈妈到西安奶奶家看望时，奶奶和叔叔坚持要我转到陕西，他们对妈妈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忧。姐姐有了男朋友，她的去向和她今后的婚姻有关。我一个人来去自由，如果妈妈不得不在咸阳呆下去，我在附近插队或招工，可以对妈妈有所照顾。

奶奶托兴平老家的亲戚，一个我称其为舅爷的养蜂人，帮我联系了长安县杜曲公社。公社同意接收我去插队，我很快拿到了从罗庄转杜曲的户口证明。

（下接第B3版 →）